



##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

200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主席：沙尔马先生（代理主席） . . . . . （尼泊尔）

主席不在，由副主席夏尔马先生（尼泊尔）主持会议。

上午 10 时 05 分开会

## 议程项目 7

##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通知

## 秘书长的说明（A/56/366）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成员们所知，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并征得安全理事会的同意，秘书长受权向大会通报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的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以及安理会不再处理的事项。

在这方面，大会面前摆着以文件 A/56/366 印发的秘书长的一项说明。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这一文件？

就这样决定。

## 议程项目 11

##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6/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瑞安先生介绍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瑞安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涵盖 2000 年 6 月 16 日至 2001 年 6 月 15 日

这一时期的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清楚地表明安理会审议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审议中这一年所展开工作方案的强度。在报告所涉时期，安理会总共举行了 173 次会议，通过了 52 项决议，并发表了 35 项主席声明。

根据其在《宪章》下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年特别注意与解决区域冲突及一般冲突局势有关的问题。

关于非洲，安全理事会广泛地审议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布隆迪、利比里亚、安哥拉、索马里、西撒哈拉和卢旺达等局势，以及在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边界发生攻击之后几内亚的局势。安理会也根据访问该区域的联合国机构间特派团的报告，审查西非各国的总的局势。此外，安全理事会于 2000 年 9 月 7 日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举行会议，讨论特别是在非洲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保安理会的有效作用的必要性。

中东、东帝汶、阿富汗和巴尔干地区局势也是安理会审议的议题。

广泛审议了伊拉克局势。

安理会还重视更加广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包括儿童与武装冲突、妇女和和平与安全、建设和平、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国际维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持和平行动。安理会还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处理了预防武装冲突的问题。

在报告所述的一年期间，安全理事会继续进一步加强其工作方法和程序。这包括通过外地特派团获得更好的信息；安理会利用特别特派团，同提交安理会的局势有关各方直接接触，包括与安理会会晤；以及根据 2001 年 6 月 13 日安理会第 1353(2001)号决议，与联合国部队派遣国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络。安理会还采取措施，以改进其程序及其各制裁委员会的程序。

安全理事会在所述一年期间进行了特别努力，以尽可能透明的方法开展工作。尤其召开了由联合国更广泛会员国参加的许多公开会议和通报会。

安全理事会成员希望，这份报告将提供有关安理会在所述一年期间各项活动的有用资料。他们非常重视大会对这一报告的审议，作为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之间对话的重要部分。安全理事会成员期待着会员国在今天讨论期间提出评论和建议。

安全理事会成员将在今后几个月审查年度报告的格式和结构，他们将审议在这场辩论期间提出的任何建议。在这一审查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将反映在明年的报告中。

最后，让我表示安理会成员感谢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专业作风和为安全理事会所作的不懈努力。他们的工作一如既往地与安全理事的工作效率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尼豪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爱尔兰常驻代表和 10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瑞安大使介绍了安理会至 2001 年 6 月 15 日期间的报告。

对这份报告的审议是在一个特别的时刻进行的。仅 3 天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这一崇高荣誉授予秘书长和整个联合国，以表彰他们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在处理人类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方面的领导作用。毫无疑问，安

全理事会为本组织获得的这一荣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目前，安全理事会对严重到威胁和平的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作出反应的唯一合法机制。因此，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工作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明智地指出的，联合国是通向全球和平与合作的唯一道路。

然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充满障碍。此时此刻，各国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国际恐怖主义的阴影下。9 月 11 日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把国际恐怖主义放在国际议程的首位。因此，如果不考虑安理会对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作出的反应，特别是 9 月 28 日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就不可能评估安全理事会去年的工作。

毫无疑问，第 1373(2001)号决议标志着国际关系中新时代的到来。安全理事会历来第一次宣布，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在任何情况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全理事会也是第一次承认对非国际行动者的活动采取自卫行动的固有权利，即便当这些行动者在第三国境内时。此外，安理会首次根据《宪章》所赋予的权力，对所有国家强行规定了一系列通常为国际条约保留的那种义务和普遍行为准则，以便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不象以前的先例，在通过这些强制性措施时，没有与某个局势或争端挂钩，也没有作出终止这些措施的规定。此外，安理会设立了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常设委员会，以监测这些措施的执行。简言之，安全理事会历来第一次为国际社会制定立法。

我国代表团欢迎该决议的内容。该决议是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的强有力的、适当的和必要的反应。此外，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恢复对多边机制的信任，以及扩大该决议中所表明安理会的权力和职责范围。

我国代表团多年来主张加强安全理事会。我们指出，安理会是人类用来对付威胁他的各种危险的唯一机制。当过去安理会放弃其权力并变得不相干的时

候，哥斯达黎加对安理会表示质疑。当安理会对最严重的政治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只是作出微弱的、不充分的反应时，我们批评安理会。当由于一些安理会成员不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或维护自私的国家利益而使安理会不能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谴责安理会。因此，我们今天只能够祝贺安全理事会一致采取了强有力的、明确的措施，以应付一个危机局势。此外，我们希望，当安理会今后遇到其他危机或紧急情况时，安理会将同样坚定地、迅速地、有效率地采取行动。

第 1373 (2001) 号决议表明了安全理事会的广泛权力。然而，安理会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负责地采取行动。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的规定，代表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采取行动。其成员无论是常任或当选理事国，都同样代表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因而对它们负责。所以，安理会必须在采取具有深远重要性的措施时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举行透明和有效的协商。

安理会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保障使人充分享有人权并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认真争取促进对根本权利的尊重。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在采取尤其象第 1371 (2001) 号决议所体现的那些措施时，必须铭记各国义务按照国际法律的要求采取行动。

安全理事会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铭记禁止使用武力是国际社会的基石，它必须继续如此。我们担心如果这一禁止被破坏，就会打开国际关系中暴力的大门。我们认为，由于自卫权利的例外非常有限，预先获得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是任何可能需要使用武力的倡议的关键。此外，我们必须谨慎地诉诸固有的自卫权利。这一权利永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它受到比例适当原则的限制。

我们在审议 2000-2001 阶段报告时，必须认识到安理会的工作尤其在帝汶和科索沃取得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成果。然而，并非其所有努力都是成功的。安理会采取足够措施来对阿富汗的局势作出反应吗？今天，答案似乎是明确的：它并未这样做。安理会禁止向叛军或极端分子集团转让武器了吗？遗憾的是，

并没有这样做。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来重振中东和平进程了吗？不幸的是，它并未采取。它采取适当步骤来对大湖区的危机作出反应了吗？所做甚微。它把足够的资源专门用于西非的冲突了吗？似乎并未这样做。它能够找到解决有关伊拉克局势的办法了吗？不幸的是它未能找到。它采取明确的措施来防止未来冲突了吗？它只是采取了几项措施。

我要谈到最后一个问题，它是今年 6 月 21 日公开辩论以及 8 月 30 日通过的第 1366 (2001) 号决议的主题。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负有防止武装冲突和其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不可推卸的道义。这一义务直接产生于所有人之间团结和友爱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不能继续对无数的种族灭绝、屠杀和战争情况作为被动的目击者而袖手旁观。

历史使我们懂得，只有确保所有人的体面的生活条件；只有以足够程度的经济发展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只有根本人权得到尊重；以及只有以民主的手段解决社会和政治分歧，才能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所以，对武装冲突的早期预防需要我们处理危机的深刻结构根源。

我们意识到，这是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任务。这一原则是正确的，但这些政府和当局必须是有效的、负责的和民主的。不幸的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看到的是各国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助长社会紧张局势，引发武装冲突。

贫穷、发展不足、种族分歧、医疗问题、性别歧视和缺乏教育机会本身并不引起武装冲突。只有在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准备唆使那些主张这些原因的团体诉诸暴力时，这些结构性因素才能引起暴力。在这方面，准备以暴力手段对这种社会要求和抱怨作出反应，以满足其自私、政治和经济野心的领导人的存在，是社会暴力和武装冲突的真正根源和不可或缺的条件。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应在预防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安理会应利用其一切外交、法律和政

治资源来支持和要求善政、法制、民主、代表性政府和对人权的尊重。促进和平需要始终和持续的努力，来创造相互尊重及反对暴力和极端行为的气氛。

我们在审议安全理事会去年的工作时，应反思我们每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对全球和平所作的贡献。我们以行动和言词支持联合国了吗？我们向它提供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使它能够完成其任务了吗？我们赋予它重要的政治支持了吗？归根结蒂，安全理事会的成就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成就，正如它的失败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一样。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谨强调哥伦比亚除其他原因外而对审议该议程项目的重视，是因为我们目前作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而承担责任。然而，我们作为大会的一个永久成员的正常地位，赋予我们额外的义务：在全体会议中向大会提供某些有关我们面前报告的内容和结构的想法。我们是本着最具建设性的精神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该报告应获得适当的政治意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A/56/2 的内容及前些年类似案文，反应出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疏远关系。

我首先要提到报告的形式方面。

今天审议的第一份草案是由安理会成员在今年 9 月初提交。在审议该文件的非正式磋商中，我们对它的用途和内容提出了疑问，坚持需要在安理会内进行辩论，以起草一份对大会有用的报告。

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说，我们和其他同事在这方面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显然，在一些常任理事国中，而且荒唐的是，在一些秘书处官员中，对这份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我们的文件，似乎并不存在修改的想法或意愿。因此，在一次公开性辩论中审议该一报告不过是走走过场，与提交给大会的这份文件的政治重要性并不相适应，而我们认为，大会是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也表达了我们的不满。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该文件的第 241 页，即报告的第二部分第 41 章也表明安理会不具备严肃和恰当

的态度，其中缺乏分析，显示了机械地通过该报告草案的倾向。哥伦比亚认为，该报告没有体现安理会应就其没能采取行动在政治上向大会负责。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件的简单汇编，等于是给安理会的活动开列一份正式清单。实际上，报告中的大部分案文已经分发，全体成员都耳熟能详。

大会需要一份分析性的、生动的、信息充分的、创新的和简单明了的文件，切实报告安理会的活动，进而加强各机构间的关系。安理会全体成员都必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并充分意识到并不一定始终存在适当条件，有助于改革本报告内容和格式。

我们知道以往曾为此作出尝试。我们也知道它是安理会全体成员以协商一致方式提交的文件。我们都了解，本机构负责监测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想就关于其活动的分析性案文达成协议，有政治上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明确表示，这些报告没有综合性价值，它们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因素，帮助联合国会员国适当评估安理会在相应期间内如何履行其职责。

我想简单地谈一个与我们今天审议的报告有关的实质性问题。

为了强调本报告与安理会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想简单提到最近几个星期内通过的一些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影响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我们尤其要提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1373 (2001) 号决议，以及其对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与安理会按照第七章通过的其他决议不同，本决议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打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极大威胁的国际恐怖主义，它的成功必须依赖联合国全体或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同意与合作。

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特殊性质，连同建立全球反恐怖主义共识的需要，应促使我们特别考虑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类安全理事会报告的用处。在这一新的国际制度结构中，没有集体的和灵活的信息制度，增强本组织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的信任，我



他们就难以采取行动。尽管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不是、今后也不会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但它却是安全理事会争取大会对其各项决定的政治支持的主要手段。

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直接关系，促使人们不断探讨可以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改革，或思考它们为自己提出的各自应发挥哪些作用的问题。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以安理会的名义，参加了 2001 年 6 月 13 日举行的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会议，该次会议的贡献和成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们提交的报告中，我们报告了会上提出的有关主张，这些主张是为了促使安全理事会更为接近、更加符合首先从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开始直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期望和理想。

我们相信，本次辩论参加者表明的看法，将构成安理会文件和程序问题工作组进行积极讨论的重要基础。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份更好的报告，适应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的需要。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时，系代表本组织各会员国。

因此，安理会应当提交年度报告，并在必要时，向大会提交特别报告供审议。

为努力改进其工作，大会在至今仍完全有效的 1997 年第 51/241 号决议中，决定大会主席应评估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并考虑是否需要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大会经非正式磋商，可以决定在辩论基础上采取任何行动。

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开始的工作不应仅仅视为是一种形式，它为我们所有人都提供了宝贵机会，借以审查安全理事会过去一年来所开展工作的深度，表明我们对工作进展的感觉，并建议安理会应如何来改进工作方法以及其与大会的关系。

我无意深究安全理事会提给大会的长篇报告深入谈到的所有问题，也不打算对报告分析这些问题的

角度作出评价。我只想对安全理事会行使《宪章》赋予的重要职责的情况、同其他主要机构的工作关系以及如何设想和提出给大会的报告作些一般性评论。

首先，我还是要对安理会在防止和解决冲突方面扮演日益积极和有影响的角色这一点表示赞赏。根据在报告所涉期间举行的全体磋商和正式会议的数量来看，安全理事会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审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或可能构成威胁的局势。

这些往往是长时间的辛苦磋商导致了 52 项决议的通过和 35 项主席声明的发布。现阶段难于估量这些决议和声明对地面影响，但这些决议和声明说明冲突的数目在逐年增加，说明联合国远远不只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的一种架构和手段。我国代表团对此当然表示欢迎，因为我们坚定忠于联合国在防止和解决冲突方面必须扮演的角色。

安理会无时不在强调必须保护冲突地区中的平民。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部署国际观察员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问题上却无法克服分歧，任由以色列占领部队对那里的巴勒斯坦平民恣意采取野蛮的行动。

还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经艰苦努力达成的安理会一些重要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竟然还没有开始执行。这种情况鼓励不服从的国家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只能损害安理会的声誉和可信性，也使呼吁安理会进行干预的国家感到失望和沮丧。

最后，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置非洲的更大利益于不顾，在全面参与制止非洲冲突和以必要的决心采取行动方面继续无法克服遇到的困难。

关于安理会工作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欢迎已取得的进展，特别是过去 3 年在透明度和提供讨论问题情况方面取得的进展。一些非正式会议现在已对非安理会成员国开放，但这些国家仍无缘接触非公开会议中举行的实质性磋商。事实上，所有影响会员国命运的决定正是在这些非公开会议中作出的。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安理会仍然是临时性的议事规则规

定安理会可举行非公开会议，但看来原本只是一种例外却成了规定，因为安理会大多数工作是在磋商室内进行的，而安理会举行全体会议只是认可闭门会议达成的协议。此外，试图让安理会拥有更大公开性的努力尽管拘谨但值得赞赏，而只要公开性还需仰仗安理会主席和成员国，在成为正式规定之前，这些努力还是脆弱的，是会逆转的。

同样，在我看来，人们可以设想一些只能有助于安理会更好行使职责的改进。例如，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可以向争端或冲突的当事方以及其他有关或感兴趣的方面开放，即使安理会后来的审议没有这些方面的继续参与，这样做显然也会更多了解事实真相。

同样，关于全体会议，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是，安理会不应像似乎已成惯例一样将可以让其他代表团也对之感兴趣的项目的审议局限于安理会成员出席。此外，安理会不仅应让冲突的当事方、而且应让有关国家在安理会成员之前发言，这样安理会成员就会掌握所有的情况，发言时能够合乎情理。

我的另一评论是关于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要求安理会召开安理会不愿或拒绝在会后采取行动的会议。我对《宪章》和联合国惯例的理解是，安全理事会不能利用诸如安理会某一成员认为时机不当的借口回避开会的要求。在提出了这种要求后，我认为即使不得不诉诸程序性表决，安理会显然也应予接受。无论要求全体辩论的国家真正动机如何，总是以让提出要求者有机会在安理会会议厅交换看法为好，而不应甘冒让它们在地面上诉诸武力的风险。

关于如何考虑和提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的问题，我想同大会最直接有关的不是安理会活动的大清单，这种清单非常全面，当然也十分有用，而是安理会对自身工作、遇到的困难、体察到工作非法上的缺陷和制约、安理会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关系以及安理会对其在世界变化上的作用和责任的评价。

如果今后安全理事会能够严格、透彻和清醒地审视安理会及其工作，并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了解这种

自我检查的全面结果，如果安理会最终决定着手考虑大会的看法和建议，安理会无疑会发现它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效率亦大为提高。

我现在谈一个微妙的问题，即安全理事会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关系。

关于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关系，我国代表团大力鼓励这两个机构加强对话和联系，因为两者的活动往往相辅相成，而如果两者不审慎，便有可能相互干扰，在预防外交和建设和平方面尤其如此。

无法举行所设想的联合会议，不应阻止两者继续寻求加强双方合作的办法。

关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关系，应该首先指出的是，尽管两个机构的主席基本上定期举行会议，但对话很不充分。更有甚者，安理会越来越倾向于着手处理属于大会权限的问题，而大会也倾向于不加抵制或不经考虑地拱手相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目前涉及大会权限问题的所谓主题辩论都是在安理会内组织召开的，有关的报道也很多。但是，这些辩论基本上只是作给媒体看的，没有什么重要性，通常随后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因为安全理事会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必要的手段落实辩论偶尔产生的结果。

大会日益变成单纯的审议机构。这种情况在一周前又一次体现出来。在经过数年的间隔又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实质性辩论时，大会无法在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中一致地拒绝恐怖主义。安全理事会是受到大会这种逐步的自我避嫌的鼓励，甚至在外交会议上加紧对大会的行动范围进行侵犯；现在安理会又在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在权限更大的机构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上擅自立法和作起决定来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各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或展开挑战性辩论，安理会竟然要求各国执行尚未生效的国际公约的规定，从而用自己取代各国的主权意志。

安理会的这种趋势无限地扩大了其权限，引起非常严重的法律和政治问题，违反了赋予安理会合法性的《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必须制止这种趋势，因为它最后将破坏多边主义、关于对涉及广大国家的问题由各国民主参加的谈判和决策的原则以及最终将危机安理会本身的作用和成效，安理会将在某种程度上离开它的主要职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这两个机构之间的更平衡的关系是必要和可取的。这就要求安全理事会尽可能严格尊重《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同样重要的是，应就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尽可能达成一项广泛的一致意见。安理会无法仍然以目前的构成和工作方法发挥其作用。扩大安理会以及加强安理会的效力，特别是通过废除否决权这样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并且只会加强安理会的代表性、合法性及其信誉。

首先，这就要求大会不是在改进其工作方法的借口下每年做些简单的修饰性的外表工作，而努力恢复其丧失的权威及其所有特权。如果我们不希望大会放弃它作为本组织的主要机构根据《宪章》所具有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愿意永远放弃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我们就必须共同面对这一挑战。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今天的辩论绝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必须通过这次辩论来采取行动。第 51/241 号决议使大会主席有机会主动采取此种行动。他这样作是适当的。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希望对今天的讨论提出的意见，同以往一样，我们提出这些意见是为了帮助改进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的工作方法，并最终改进整个联合国组织。

**侯赛尼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爱尔兰常驻代表、安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瑞安先生介绍了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报告。我还谨借此机会祝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保加利亚共和国、墨西哥、几内亚和喀麦隆当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我相信这些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的开放性、透明度和代表性，使其达到联合国这个主要机构目前结构下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我们极其重视目前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我们将审议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其工作方法的年度报告，安理会的工作是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按照《宪章》的规定提交年度报告是一种体制联系，确定了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的问责制。也就是说，年度报告代表着安理会努力达到会员国的期望，并使其工作对会员国负责，安理会是从小会员国获得其权利的。

关于报告的内容和结构，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努力改革安全理事会报告程序的第 51/193 号决议。这项决议鼓励安理会提供关于其工作的实质性、分析性的资料说明，并除其他外列入关于安理会在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一些问题采取行动之前进行全体磋商的资料。

在仔细审议了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这次报告后，我们注意到这份报告仍然只是一些文件汇编，回顾其各种活动、复述这些活动的事实，等等。这份载于 A/56/2 号文件中的 571 页的报告涵盖 2000 年 6 月 16 日至 2001 年 6 月 15 日期间，同过去大会收到的报告一样，它只是叙述了安全理事会做了一些什么，而基本上没有说明导致作出所通过决定的原因和情况。

在这份报告中仍然没有向非安全理事会成员提供关于各次非正式会议的资料。在报告所涉期间共举行了 185 次全体磋商，共 325 个小时，而正式会议则有 173 次，这表明非正式会议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安理会决策中的作用。尽管全体磋商具有这种重要性，非安理会成员却继续不了解安理会是如何达成各项决议以及如何和为什么没有达成决议，只能由每个代表团自己去猜测。这是一个清楚的例子，表明非安理会成员代表团如何对安理会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仍然不了解或获得一些错误的资料。

使安理会的报告更具分析性是第 51/193 号决议提出的目标之一，同样这一目标也尚有待实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用这一标准来评判今年的报告，显然还有改进的余地。

然而，我们认为到这份报告的内容以及编写报告所使用的方法已有所改进。并应指出，这是近年来一直在继续的一个进程，我们希望将继续到底。在这方面，我们可提及近几年来为使安理会更具透明度而作出的一些努力，包括增加了公开辩论的次数和缩短其间隔时间，我们认为这是向前进的重要步骤。然而，我们认为在增加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方面仍有很大改进余地。

总体来说，我们确信报告内容没有改进余地，那样将会更好地描述安理会的工作并确保更佳利用报告。

更为广泛的来说，安全理事会在过去数十年里处理一些动荡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局势的方式表明了其工作方法的不足和不适当性。安全理事会在过去曾多次被要求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结束以色列当局的不人道和侵略性行径。但令人遗憾的是，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时常使安理会瘫痪，阻止其履行在该关键问题上的法律责任。

在报告所涉时期，尽管安全理事会关注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持续危机，尽管在一些安理会成员担任主席的主持下组织了一些公开会议，但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的持续侵略政策和安理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使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有任何缓解。遗憾的是，安理会没有能够履行其针对以色列对动荡的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构成威胁的责任。我们应当记住，行使否决是该失败的主要原因。今年 3 月使用否决被证明不利于该地区的动荡局势。联合国观察部队在实地的存在无疑本可以阻止更多暴力和流血的发生并本可以拯救更多宝贵的生命。

另一方面，我需要承认在报告期间安全理事会对阿富汗的局势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阿富汗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该国动乱和法律混乱现象所产生的对邻国和更广范围的威胁成为安理会去年优先事项之一。安理会于去年 12 月通过了第 1333 (2000) 号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主要侧重于塔利班向国际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场所问题并要求立即结束这种做

法。最近对美国领土的恐怖主义行径使阿富汗境内的动荡不安给整个国际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令人关注，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仍然积极处理该国的局势。我们看到并赞赏整个联合国系统对阿富汗危机各个方面的关注，我们决心积极支持各联合国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为恢复和平和帮助阿富汗人民在他们的国家建立具有广泛基础和代表性的政府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然而，阿富汗局势的新的发展十分令人担忧。毫无疑问，塔利班的许多行动，例如庇护恐怖主义、贩毒、屠杀阿富汗什叶少数民族成员、谋杀伊朗外交官等待均违反最基本的国际和人道主义法律。但同样明显的是，不应该因为塔利班的行径而使阿富汗人民受害。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感到不安的是，来自阿富汗的媒体报导指出，由于正在进行的空袭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我们期望在该国参加军事行动的各国表现克制不要参与将破坏无辜人民生活的活动。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处在整编信息并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指示和指导将其编辑方面所做的有益的工作。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在两星期前就恐怖主义问题所举行的辩论显然是大会今年会议的最重要的辩论。有 167 个国家参加。今天关于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报告的辩论应该是第二重要的辩论。遗憾的是，今天的参加情况远不如意；最后一次统计大概只有 52 个代表团将参加。

或许大会某些成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政治权力在联合国大家庭内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在冷战时期，由于交叉使用否决，安全理事会处于停滞不前状态。重要辩论主要在大会里举行。在后冷战时期，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安全理事会，尽管安理会在 1990 年代仍然有其动荡不安。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安全理事会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安理会最近通过的第 1368 (2001) 和 1373 (2001) 号决议是重要的决定。特别是第 1373 (2001) 号决议使所有国家有义务采取打击恐怖主义的意义深远的措施，这将得到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监测。因此，确保成



功落实这种重要的决议的法律和现实政治要求强调了必须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关系。这应成为这次辩论的主要目标。

《联合国宪章》授予安全理事会广泛权力，使其成为整个世界唯一最具权力的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或七国集团在内的任何其他国际机构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会对每一个成员国具有强制性质。在过去十年中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安全理事会悄悄地建立和扩大《宪章》授予其的权力。今天在联合国环境内，安理会比任何联合国其他机构都占据有更多的政治空间。安理会还打开了新的局面，建立起专家小组、监测机制和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国际法庭；这两个法庭在 2001 年花费了两亿零六百万美元，相对而言理论上讲更为重要的机构国际法院的预算仅为 1 000 万美元。

2001 年，安全理事会控制了耗费联合国超过 30 亿美元的维持和平行动，相比之下，12.7 亿美元用于经常预算。年度预算的这一巨大差距清楚表明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社区具有的相对权利和影响。如果允许我讲一句题外话，对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秘书长和联合国组织进行反思大概是有益的。秘书长获得这一奖励当之无愧；他将本组织的声望提高到新的高度。对奖给联合国的另一半，大家庭那位成员获得了这笔奖金呢？是经常以其官僚记录受到不公平批评的秘书处？是大会？是经社理事会？还是安全理事会？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认为在我们接受奖金时值得提出这些问题。

鉴于安全理事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权利，它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并未被联合国会员国看做一次进行严肃反思的重要时机，这使人感到愕然。的确，作为本届安理会成员，我们对安理会就这份报告未加任何严肃讨论或反省便将其通过感到十分困惑，尽管安理会主席于 1997 年发表一份说明 (S/1997/451)，表明安理会愿意将报告写的更具有分析性，但是，这份出版物基本上照搬其他地方已有的联合国文件。我们认为改变这种局面的时机已经到来，安理会应该考

虑以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 (A/56/1) 为模式编写其报告。这份报告即简短又具有分析性。它长达 45 页，编制成本为 46 000 美元，而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有 571 页，编制成本达 581 000 美元。对文件符号的简单罗列甚至一个网站足以使安全理事会报告的例行内容及其很大部分变为多余。如果这样的话，联合国每年可节省 50 万美元。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或实施这样一个简单建议？我们对这份有相当份量的年度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不满意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在安理会于 2001 年 9 月 18 日的第 4375 次会议上公开表述我们的保留。为记录起见，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完全同意哥伦比亚常驻代表阿方索·巴尔迪维索大使今天早些时候作出的评论。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注意他的评论。

在去年就此项目的辩论当中，一些代表团曾就如何改善安全理事会报告提出尖锐和有用的建议。比如，意大利指出，它不过是一份会议、决议和主席声明的目录。意大利还建议报告更加充实和具有分析性，从而使我们更好地对安全理事会在和平和资源领域工作的所有方面和成效进行评价。我们同意意大利和去年提出建议的其它成员国的看法，并感到高兴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今年还就第 51/193 号决议提醒我们；该决议要求报告内容更加充实和具有分析性。遗憾地是，这些建议在年度报告起草过程中均未得到考虑。我们希望今年的辩论将有所不同。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建议安理会在今天辩论后不久再次召开会议，对今天的评论作出评价并在草拟未来报告时将他们考虑进去。我们希望，安理会将采纳这一合理建议，并将认真商讨今天上午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哥斯达黎加代表关于安理会工作若干实质性问题所作的非常好的提问。

为避免误解，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想在这次辩论中负有建设性。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和人一样，多数机构在只有缺乏眼力的情人或偏袒的批评家面前失去活力。安理会需要充满爱心的批评者。我们充当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批评者符合国家利益，大会多数会员也如此。一个更强大而不是更软弱的安理会使我

们作为一个小国享有特殊利益。因此，在 1 月份我们首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我们主办了一次就加强部队捐助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合作的辩论。其结果是，安全理事会成立了一个维持和平行动工作组。安理会最终于 6 月 13 日通过第 1353 (2001) 号决议，并承诺考虑部队捐助国关于新机制提出的具体建议。我们提出这一建议是要表明如果作出创新和如何改善安理会。

因此，我们鼓励大会会员国向安理会表明他们关于如果改革年度报告和年度辩论应如何进行的观点。坦率地讲，迄今为止的所有大会辩论都例行公事，但这种令人惋惜局面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在大会会员国自己。这种行为说明大会的日益削弱和不相关。当一位德国议员埃伯哈德·布雷希特先生于今年 8 月份声称他认为安全理事会正失去重要性并且声望下降的时候，我们深感迷惑不解。我们遗憾地指出，这种描述用在大会身上可能来的更加真实。附带说一句，布雷希特先生在同一份文件中所作的如下观察更加有力，他指出，

“我们更应该寻求这样的程序，使安全理事会成员无法轻易将其国家利益置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之上”。

为使我们的讨论更具有意义，我们想建议大幅度精减这份年度报告，它应包含三个部分：描述的、分析和和建议性的。我们建议的格局在发言附件中已有所阐述。我的发言稿已经分发给各位，我希望各成员参照附件。

第一部分的描述性内容应限定安理会的工作量。附件中提供了安理会工作量的一些具体指数，它们应该以一种方便使用者的方式提出，以便任何变化能够轻易得到辩认。我举一个例子，1999 年，服务于联合国行动的有 9 000 军事人员和 2 000 民警；目前有 35 000 军事人员和 8 000 民警。这一大幅度增加是在本报告涵盖阶段发生的；但在报告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一增加得到讨论或记载。一个重要国际组织——政府间

或非政府——考虑建立一种外部监督机制来衡量和监督安理会决定和结果的影响的时机大概已经到来。

第二部分应包含分析性回顾。我们对此分析部分是否易于编写不抱幻想。的确，又提到我的朋友阿方索·巴尔迪维索大使今天上午的发言，他本人也承认分析性描述是困难的。即便简单的描述也可能在政治上引起争议。我们并不幼稚。然而，我们的确认为，在指引新的航程最初困难过去之后，安理会能够就其每年的工作成绩提出分析回顾，这在很大程度上——这点值得突出强调——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安全理事会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相反，安理会倒有一些值得称颂的成功事例，比例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在一定程度上——柬埔寨。东帝汶的工作正在进行，在联合国的持续参与下，它有可能成为联合国的模范成功范例；我们希望联合国在东帝汶独立之后仍保持全面介入。

为了获得这样一份分析报告，如果大会成员国可以对该分析章节可以涵盖的关键问题或层面提出建议，那将大有助益。为了推动这次讨论，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在审议年度里处理了哪些重要的和平与安全——例如，伊拉克、科索沃、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东帝汶等等？各领域取得了什么进展，或出现了哪些倒退？这些趋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第二，哪些长期问题——例如塞浦路斯、索马里、安哥拉——10 年来一直列在安理会议程上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如果情况属实，则原因何在？第三，哪些安全理事会工具——维持和平行动，制裁，安全理事会代表团，专家小组，监测机制——证明切实有效且原因何在？第四，对每个问题和区域的拨款有多少，结果如何？第五，在这一年期间吸取了哪些重要教训？

吸取教训问题特别重要。我们自加入安全理事会以来，发现安理会同任何其他人为机构一样并非十全十美。安理会确实犯过错误，几个例子可能有助于表明这一点。安理会每年在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

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上的支出大约为 2 亿美元,但它却不愿拨出 500 万美元支付边界委员会费用,而完成该委员会的工作将有助于早日结束埃厄特派团使命,并节约几亿美元。安理会每年在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上支出 8 亿美元,但不愿花 270 万美元从事解除武装、遣散和重返社会方案,该方案将大大有助于实现特派团的关键目标。这些都是小例子,但显然表明安理会可以而且确实应该得到改善。顺便一提的是,我们应该正式地提及,我们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已经指出这些错误。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对我们的关切作出回应。

政府和企业界的所有组织最近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在迅猛变革时代停滞不前和原地不动最要命,安理会显然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尽管几个当选成员曾在今年头 10 个月发出呼吁,但安全理事会非正式工作组仅就安理会文件和其他程序问题召开一次会议。

人们要提出的明显问题是:这样不开会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那么是谁在故意?这些就是我们z应该提出的那类问题。有些幸运的是,这个难以安排的小组将在下周爱尔兰担任主席期间召开另一次会议,除其他事项外特别讨论如何改进这份年度报告。

不愿改革其工作方法和程序是安理会内部根深蒂固的特点,一场辩论不会改变这种情况。的确,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也花了许多小时的时间来讨论第二组问题。不幸的是,他们的结论根本没有被安全理事会自己的程序和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采纳。

最后,让我表明,我们承认变革来之不易。变革对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机构来说特别困难,因为他独一无二地享有不受任何正式审查也不得追究其责任的普遍权力和豁免。安理会很容易感到不可战胜和无懈可击。但是,安理会也许应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同样强大的全球组织中吸

取一二个教训。这两个组织的地位近年来有所下降。这两个组织了解了对公众负责的重要性。

矛盾的是,安理会没有正视对公众负责的呼吁,其唯一理由是,安理会的活动都隐藏在较大的联合国大家庭结构内。《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明确阐明,安理会在履行其职责时代表联合国会员国行事。换言之,安全理事会从更广泛的会员国那里获得其权力。因此,如果有朝一日因大会没有使安理会在政治甚至法律意义上成为一个也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机构而被追究其责任的话,大会不应感到惊讶。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本次关于这个议程项目的辩论是在联合国受到挑战之时进行的。面对 9 月 11 日的悲剧,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履行其责任。国际社会指望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我们相信大家听到了这项呼吁。

我感谢理查德·瑞安大使介绍这份报告,并感谢秘书处为制订这项文件进行工作。

我们承认瑞安大使努力使这次介绍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因为不幸的是,我们面前的原始材料——即文件 A/56/2 所载的报告——再次非常令人失望。

人们沮丧的看到,报告仍不过是一项决定汇编和文件清单。因此,今天在这里发表的评论大都以各代表团从其他来源而非报告中收集的情况为依据。

很难想象安全理事会会同意在一份与此类似的报告基础上审议其议程上的任何问题。指望安全理事会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安全理事会成员都知道,这份报告没有达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期望。我们同意马布巴尼大使、巴尔迪维索大使和莱维特大使在安理会通过该报告以前进行讨论时所说的话,即应该为制订一项更加有意义的报告作出更大努力。让我重申,我完全同意巴尔迪维索大使和马布巴尼大使所做的发言,特别是两位大使提出的出色、准确和具体的提议,大会目前收

到的报告不符合安理会自己为使其工作更加透明而正在做出的努力。

我们鼓励安理会继续努力克服过时的做法，并提出一份切实履行《宪章》第二十四条第 3 款所载义务的文件。

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有益报告应不仅具有分析性，而且还应具有翔实的内容。报告应载有安理会前一年工作的资料，并载有对如何处理每个问题、取得哪些成就、安理会如何执行其任务、处理问题的方法如何得到改善，以及有什么障碍阻碍安理会执行其各项决定等问题进行的分析。

问题的关键不是报告的长短。而是提供情况的质量和深度。我再次认为，马布巴尼大使关于报告由三个不同章节组成的构想非常理想。

**副主席杜尔达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持会议。**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建议安理会根据《宪章》的设想，在一年的不同时候向大会提交特别报告，介绍它关于各主题的工作，包括关于各具体局势的工作。这些特别报告可以促进对安全理事会完成的工作和面临的困难进行更加有重点的辩论。特别报告不应该是现有年度报告的季度版，而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因此，每年可以不止一次地举行大会，讨论目前审议的议程项目。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不应该局限于 10 月中旬为期一天的辩论。两者之间的互动应该更加流畅，更加固定。

安理会有足够的材料，可以提出有重点、有分析的特别报告，例如，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建设和平、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与部队派遣国的合作、在执行制裁制度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及现在遇到的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

为了改进年度报告内容，安理会应该考虑为此建立具体工作组的可能性。安理会主席应该不仅仅是向大会提出报告的人。他或她可以将对报告所涉及一年的评估作为自己的职责。

全体会员国对安理会工作的了解远远超过报告的陈述。对那些愿意了解安理会活动精髓的人而言，报告并没有太大助益，因为安理会的良好努力没有见诸报告。安全理事会太重要了，其决定深刻和广泛地影响国际社会，如果不充分报告这些决定，则不符合安理会利益。

一般会员国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提出有实际意义和有实际内容的报告，这将提高安理会决定的信誉和合法性。否则，如果不能适当叙述安理会的工作，大会对安理会工作的评估可能不全面，甚至可能不公平。

该报告所涉时期是安理会非常繁忙的时期。遗憾的是，这表明国际社会没有能够建立《宪章》起草者设想的和平、稳定、公正和繁荣社会。

巴西仍然特别关注安哥拉局势，安理会加强了执行制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措施的活动，我们对其工作方式感到满意。瑞安大使领导的安全理事会安哥拉局势委员会和拉腊因大使领导的制裁安盟监测机制值得称赞，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努力，剥夺安盟进行战争的工具，从而挽救了安哥拉人的生命。

我们还非常关心地注视着东帝汶走向独立的过程。秘书长一开始就发挥了领导作用，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首长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和他领导的团队开展了令人钦佩的工作，这些努力正在为顺利过渡到建立国家铺平道路。我们还谨赞扬东帝汶人民的政治成熟性，在过渡时期和和平举行选举过程中，他们表现了这种成熟性。国际社会需要为东帝汶作出更多努力，以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期待安理会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形成集体意愿，促进东帝汶的繁荣、区域融合和民主。

安全理事会日益透明，其议事程序更具有包容性，我们欢迎这个趋势。非公开会议、公开通报、公开辩论和主席每日通报的做法都有助于使一般会员国了解安理会的工作。今天，安全理事会更加意识到



必须与部队派遣国进行深入对话，巴西对此感到鼓舞。安理会能够考虑会员国的观点，讨论制裁和维持和平行动问题，这也是一个积极现象。谨再次指出，我国代表团欢迎每月月底举行公开总结会议的做法，并鼓励安理会各成员——特别是即将离任的主席——利用这些会议，评价安全理事会履行职责的绩效。

为了使这种变化超越工作方法，直接影响安理会核心职能，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必须接受下述事实：透明度是双向的。这意味着愿意与一般会员国进行更多的互动。安理会如果更加强调透明度，如果通过常设机制与一般会员国分享信息，那么，安理会将能更加有效地影响其议程上的事项。这是透明度的自然产物，我们真诚地希望安理会各成员能够接受这种产物，促进本组织的利益。

同样重要的是，一般会员国应该可以感觉到，安理会各成员真正致力于执行他们规定的任务。例如，这种感觉——最终是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和责任感——应该产生于下述事实：安理会各成员积极和实际参与解决安理会面前的所有问题，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物资手段和人员。

我们还认为，安理会派往各国家或地区的特派团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特派团可以提供关于现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帮助更好地认识当地的形势。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是国际社会意愿的表达形式。安全理事会决定与广大会员国的认识脱节是本组织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工作必须趋于一致。通过相互增强，更容易实现联合国的最高理想。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增强安理会与会员国之间的互动，以弥补有时出现的缝隙。

毫无疑问，最近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反恐主义委员会就是这种机会之一，因为第 1373 (2001) 号决议明确要求与广大会员国通力合作，不断对话，以实现我们为联合国制订的各项目标。因此，委员会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干练领导下开展活动的方式使我们感到鼓舞。他关于委员会工作的通报充分体现了合

作的广泛性和新动态，在安理会与会员国的关系中，我们必须促进这种合作。

这还强调说明，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使安全理事会更具代表性，更有效力，更具合法性。新安全威胁的现实强调说明，我们的世界与 50 年前的世界不同，在这种时刻，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必要性更加明显。

由于安理会在处理议程项目时不公正，以及由于在一些情形中安理会成为旁观者，安理会的工作被指责有选择性，其工作遭到质疑。

虽然存在各种障碍，安理会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巴西坚信安理会的这些能力。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对这种威胁迅速作出反应，最终通过了第 1373 (2001) 号决议，这证明，如果安理会有决心、有毅力、团结一致，那么安理会就能够果断地作出决定。我们相信，在其他议程项目上，这种议事模式将重现。

工作责任非常关键。只有增强工作责任，会员国才能确信，它们根据《宪章》委托给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得到令人满意的履行。今天，安理会比以前更愿意解释其责任，其部分原因是，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更加透明。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份报告和大会关于该报告的讨论作为衡量透明度和工作责任的尺度，那么其评级是令人失望的。

巴西请安全理事会不仅今天而且全年都花时间和精力注重这次辩论，并且加紧努力，于明年向大会毫不含糊地展示，它致力于加强其工作责任。

在困难时刻，所有会员国都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关键作用更加明显。正是在这种时刻，我们希望安理会团结一致，勇于承担责任，开放和愿意采取行动。在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我们需要一个坚强和明智的安理会，一个不仅能够代表联合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联合所有国家参与共同事业的安理会。如果这样，安理会将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将加强整个联合国。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爱尔兰的理查德·瑞安先生，介绍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第 56 次年度报告。我们认为，大会审议安理会的年度报告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而且是广大会员国能够对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表现进行自由评论和作出评价的时候。

本组织广大成员明确表示希望就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提出内容更加丰富和更加分析性的报告。在大会这里以及在关于安理会改革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及在振兴大会工作的非正式会议上都表示了这个意见。尽管我们欢迎目前报告的形式有了改进，我们希望，今后的报告将更加全面和具有分析性。

我们也欢迎安理会主席每月报告形式的改进。但是，尽管这些报告现在比以往更加具有实质性和内容更加丰富，但基本上还是描述性的，缺乏对安理会处理问题的分析。我们谨建议，让安理会主席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对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

我们希望，安理会的非正式文件和程序工作组将注意本次辩论中广大会员国提出的关切。事实上，如果在本次辩论之后，安理会主席或他的继任者安排时间在安理会就广大成员有关本报告的意见、看法和建议进行讨论将是极其有益的。因此，我愿鼓励曾提出同样建议的新加坡的马布巴尼大使推动他在安理会的同事们对会员国在这里表示的意见进行其应有的认真的审议。

在报告所涉期间，安理会举行了许多主题辩论，除其他外，包括维持和平、安全与冲突后和平建设，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这些辩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论坛，使安理会和非安理会成员都有机会解决同和平与安全的总问题有关的相互交叉和复杂的问题。需要以综合方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需要制定全面和连贯的战略，涉及整个联合国系统。但是，安理会必须谨慎行事，不要越来越多地干涉绝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的领域。而且，尽管这些主题辩论总的说来是有益的，最好不要做得过分，从而只是为了其本身的

缘故而进行主题辩论，或是在安理会每月的工作方案中填补空档。

除了主题辩论和公开辩论之外，我国代表团也支持更经常地召开安理会的所谓的非公开会议，安理会举行非公开的正式会议，同冲突有关国家和有关方面的代表交换意见。我们相信，这些非公开会议大大有助于改善安理会的决策进程，使安理会更了解有关国家和方面，并在作出决定之前听取它们的意见。然而，这些辩论虽然有益，绝不能取代安理会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

我们注意到，在报告所涉期间，安理会代表团访问了科索沃和非洲的大湖区。我国代表团欢迎向冲突地区更加频繁地派遣安理会代表团。马来西亚在担任安理会成员时过去曾参加三个这种代表团，我们感到，派遣这种代表团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这些代表团使安理会成员能够更好地了解现场的局势，从而使安理会能够就这些问题作出更加正确的决定。我们也欢迎在安理会代表团返回之后立即召开安理会公开会议，对其报告进行审议。这一做法应当成为安理会工作的一个永久的特点，因为这进一步增加了安理会在本组织广大会员国面前的透明度。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在安理会每一任主席任满时举行总结会议是有好处的，以便对该月安理会的工作进行评估。向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开放的这次会议是一个新的和有用的机制，使安理会能够审查其表现并确定必要的后续行动，并且能够使广大会员国对安理会工作获得有益的深入了解。

我们过去多次指出，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安理会将仍然是一个过时的机构，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期的过时的现实和权利平衡。否决权的继续存在使得安理会的决策进程较不民主，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安理会的僵局和瘫痪。否决权问题是安理会在波斯尼亚大屠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科索沃“种族清洗”问题上束手无策的原因所在。它过去和现在继续是安理会未能对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有人威胁使用否

决权才使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解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目前的严重局势。

至于安理会实施的制裁问题，秘书长本人已经强调了他所谓的当联合国在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时面临的严重的道德困境，一方面促进和维护和平，另一方面由于惩罚性制裁对国家产生的影响而增加无辜人民的痛苦。作为一般原则，马来西亚反对对一个人民实行制裁，因为制裁可能对无辜人民产生破坏性影响。我们认为，制裁是一项粗暴的武器，经常不仅惩罚预期的对象，而且也惩罚无辜的人民。

但是，如果按照《宪章》规定，在除了武力之外所有其他措施都失败之后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制裁时，应当在对可能的影响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才实施制裁。这是为了确保制裁不仅对预期的目标，而且对整个人口产生所希望的影响。而且，使用制裁时必须遵守一些明智的参数，包括具体和明确规定的目标，确定时间限制和定期对影响进行评估。在这方面，所谓聪明或有针对性的制裁应当是唯一可允许的制裁形式，因为它们比全面制裁更加人道。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仔细考虑制定更加有效和人道的制裁制度。我国代表团坚决鼓励安理会目前进行的讨论，旨在寻找更加有效地执行和管理目前的制裁制度的方式和方法，这将成为安理会今后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对会员国实行制裁的有益的指导方针。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安理会对制裁的管理倾向于受到政治考虑或权宜之计的影响，而不是遵循原则。

我们认为，安理会越早解决秘书长所说的道德困境，它的威信和声誉就越高。在道德和惩罚违法国家的两个必要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我们希望，安理会将谨慎地注重道德，以此解决这两个必要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它不能被指责容忍在制裁下生活的无辜人民的死亡、毁灭和痛苦。

在这种局势中，由于制裁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可以被认为超越了实行严格制裁制度的重要性。这方面的伦理和道德论点为审查和大幅度改变现有制裁制

度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目前的制度或者未能充分实现其目标，或者已变得不再适应现实。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安理会终于撤销了对苏丹的禁运。过去曾多次试图这样做，但由于投否决票的威胁而未能成功。我们期待着安全理事会在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制裁问题上采取类似行动。

关于与部队派遣国的会议问题，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第 1353（2001）号决议中的积极内容。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该决议未能吸收很多部队派遣国的看法，包括关于部队派遣国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有阶段的建议，特别是在维和行动的概念和接战规则问题上。这将有助于解决各个部队派遣国之间在军事学说和指挥——控制结构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别。

我们还希望，有关各方——安理会成员、部队派遣国和秘书处——都将充分利用与部队派遣国举行的会议的经过扩大的新形式，并希望这种会议将更有交流性。安理会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会议不应流于形式。

我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参加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一个会议，以便就安理会过去的工作方法交流经验和交换意见。我们赞扬工作组主席团和当时的安理会主席使这次交流能够实现。安理会成员与工作组之间进行的坦率和热烈的意见交换证明是极其有用的，为安理会成员和工作组成员提供了关于彼此工作的重要认识。我们希望，这种交流将导致在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内进行更多非正式和重点突出的讨论。

两周之前，在涉及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时，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努力使联合国从一种反应的文化发展到一种预防的文化。我们认为，安理会还可以在预防外交方面发挥作用。为此目的，它可以与秘书长密切合作，鼓励他提请安理会注意那些有可能导致爆发公开冲突的问题和事态发展，以便能够采取适当步骤防患于未然。为此目的，我们强烈鼓励在秘书长和安理会成员之间进行更经常的非正式接触和交流。

我们感到，实践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是在他们之间进行更经常的非正式接触和讨论，例如举行秘书长本人大约三年前首先提出的包括安理会成员参加的周末务虚会。如果更经常地举行这些非正式集思广义会议，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每年一次的话，将大大有助于安理会和秘书长处理正在安理会中审议的困难问题，包括那些有潜在爆炸性的问题。

去年9月举行的历史性的安理会首脑会议明确地承诺使安理会的工作更有效和更有效率。通过在第1318（2000）号决议中详细说明的这项承诺，安理会承诺加强其采取有效行动、采取预防性行动、以及采取迅速和决定性行动的能力。我们期待着安理会象载于文件 S/PRST/2001/10 中的主席声明中所具体说明的那样就该决议采取后续行动。这个主席声明表达了安理会承诺进一步在非安理会成员国的积极参与下进一步审查实施第1318（2000）号决议方面的进展。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祝贺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即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它们将从明年开始任职。我们祝贺它们取得一切成功，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将能丰富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范德贝格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今天审议的核心问题是安全理事会与所有会员国之间的联系。仅靠几个强国已不再能有效地处理安全问题。需要有广泛的联合阵线——广泛在此指的是地理上和能力上——以克服冲突和对国际安全的其它威胁。9月11日的悲惨事件及其后果突出表明了这一事实。安全理事会显然了解到使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有效地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事例中，这个问题显然影响到我们所有国家。因此，让我们利用目前的势头来考虑在安理会和所有会员国之间结成持续和多方面的联系的可能性——结成一种能够在安理会的任务范围内为任何目的而随时加以利用的联系。

在政府间决策方面，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加强本组织的各主要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

继续发展我们迄今为止在促进安理会与所有会员国之间的联系方面取得的成绩。

去年，我们看到安理会成员日益认识到，向非成员通报情况和使他们参与安理会的工作有利于安理会的工作。也是由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作出的不懈努力，在安理会日常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样，我们可以对实现了部队派遣国更密切的参与安理会的工作感到自豪。安理会对以下事实有明确的承认：这样一种参与程度早就应该实现，而这样做归根结底符合安理会本身的利益。

关于部队派遣国问题，我们感到，我们已到达了一个关键阶段。如果说安理会在任何方面迫切需要与所有会员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反之亦然——的话，那就是在与部队派遣国的关系问题上，因为正是这些国家提供将面对安理会决定的后果的男女人员。因为这些男女人员们为和平事业而经历风险，所以理应在准备和管理和平行动的过程中实行最大限度的透明度和广泛包容性。

幸运的是，安全理事会已经对这些关切问题给予越来越敏感的注意，并正在逐步参与与部队派遣国的交流过程。非成员国今年1月16日在安理会关于加强与部队派遣国的合作的公开辩论中表达了它们的观点，导致设立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行动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在其审议工作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放和与非成员的协商。安全理事会第1353（2000）号决议无疑反映了这种进展，是在这方面向前迈出的第一步。通过这样做，而保持了建立一个使部队派遣国更深入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的机制的选择。我们预期，安全理事会工作组目前的审议工作将导致提出有关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议。

谈到把一般成员与安全理事会工作联系起来，我们不应把它局限于临时介入具体问题。我们还应检查在体制一级建立更好联系的备选方案。显然，《宪章》规定了联合国各主要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但迄今很少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定。



尽管联合国在改进其机构的协调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政府间一级的决策进程却不是这样：联合国的主要政府间机构并不合作或协调，谈不上任何互动和整体化，或至少是各项政策的融合。然而，这些机构显然各自以其合法的角度基本涉及同样的问题或这些问题的重要方面。由于没有相互联系，这些机构合在一起可增加的价值远不会最理想。从这一意义上讲，全体会员国均未能履行其职责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政府间手段来成功地处理紧迫的全球问题。

一个更好的政府间联系会产生巨大利益的领域就是经济状况和冲突之间的灰色地带，尤其是冲突后建设和平范畴内的政策与活动范围。显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共同担负着责任。因此，让我们注意秘书长去年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学会如何一起更好地管理。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在《千年宣言》中所做的保证，推动联合国各主要机构间的定期协商与协调。善政不仅应是在国家一级作出的承诺，也应当成为政府间一级的长期作法。

我至此所说明的是：我们认为急需在安理会与广大会员国之间建立更积极的相互联系；我们还表明了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并指出挑战在那里。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在所有这些方面适合哪一方面呢？

我们面前的报告是一种不同程度上涉及更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信息的混合体。无疑，它是本来就公开的安全理事会议事程序的可靠记录，例如，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具体国家局势的背景情况，不外乎是对也完全能够在报告附录中找到的各项决议与主席声明的详细解释。否则，报告无疑是一部大百科全书的杰作，然而它却不可能激发一次关于安理会在过去一年中活动的激烈辩论。

报告中明显有一处省略，即没有提及安理会所成立的工作小组的会议，如维持和平工作小组会议——这失去一次机会，因为这些工作小组处理象维持和平这样的问题，对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还有联合国部队派遣国具有极大的兴趣。

然而，报告中真正阐述性及多少是实质性和详尽的部分隐藏在附件中。该部分载有安理会历届主席每月任期完成后所发表的报告，使我们能够在报告中找到最直接的情况分析，我们需要这种分析来就这一议程项目展开有意的辩论。

在这方面，我建议安全理事会从秘书长的年度报告中得到启发。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或许今后想采取这样一个模式，这样，各会员国会更充分地准备，就安理会过去一年中的活动进行深入的辩论，这会大大提高我们今后在该议程项目下进行辩论的意义。

**德里维罗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对爱尔兰常驻代表理查德·瑞安大使及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介绍该机构的年度报告表示我们的谢意。

秘鲁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收到该报告，该条明确承认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中代表本组织成员国采取行动的责任。

秘鲁确信，安全理事会与大会所代表的全体会员国之间顺畅、有效和定期的互动是重要的。这促成了本组织在体制、形势、理论和业务方面调整所需要的协商一致，以便我们能够一道坚定地面对国际及安全及发展领域中的多重挑战。

我们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集体反应中的最近经验证实了这一信念。安全理事会理所当然地作出反应，履行其职责，通过了第 1368（2001）和 1373（2001）号决议。不幸的是，大会中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140 多个会员国参加了有成效和全面的辩论。然而，大会未能确定明确的方针，以加强在整个国际社会深切关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安全理事会成立了一个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其权限为核查对其 1373（200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为此，它将在各个方面得到一个专家小组的帮助，这是战胜这种灾害的斗争所需要的。我要宣布，秘鲁坚决与该委员会合作。由于我国是成功地消除了恐怖主义谨有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认为秘鲁完全能够帮助安全理

事会执行这种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正评估建议任命一位秘鲁专家为这一咨询小组成员的可能性。

我们争取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协作，认为大会主席需要执行 1997 年 8 月 22 日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第 51/241 号决议。该决议指出，根据关于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审议，

“应在大会主席或一名副主席主持下——进行非正式协商，以便根据对报告所作辩论的情况讨论大会可能需要采取的行动。”（51/241，联合国附件第 7 段）。

有关这项建议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解决涉及国家分裂的国内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处理这些国内冲突必须从一个全面的角度考虑。这一角度包括采取行动防止国内冲突的爆发；恢复和平，如果预防行动失败；和平恢复之后，对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采取惩罚行动；以及最后，人道主义援助。通过这些行动，冲突是可以被制止的。但在冲突后，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可行的国家，换句话说，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可以维持的国家。

显然，解决冲突及其随后建设一个可行的国家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参加，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但是，建国的的工作若要有效，我们就必须再进一步，获得私营部门参加和外国私人投资的承诺，以创造具有全球性竞争优势的公司，支持重建后的国家的长期经济生命力。

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是，这个委员会不能只听政府专家的意见，他们还应该同银行、参与国际货币交易的私营金融公司，以及有促进人权和民主工作经验的非政府组织协商。

关于根据第 1353 号决议执行的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派遣国必须尽早直接参加界定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任务的权限和范围。这将大大提高这些任务成功的机会，是一项联贯、切实的措施。虽然该领域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我们认为仍然需要有一个正式的相

互关联的和补充性机制，使这些国家能参与修改和延长联合国行动任务期限前的工作。

秘鲁希望，这些简要的建议，特别是专家对安全理事会恐怖主义问题委员会可能作出的贡献和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和私营部门参加国家崩溃后建设国家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的意见，能够帮助安全理事会作出更加有机的行动，并通过这一行动，使本组织更好地管理冲突。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爱尔兰瑞安大使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介绍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再次清楚的是，安全理事会任务的数量和复杂性继续增加。越来越多的是，继续阻碍我们争取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挑战表明需要在所有会员国中间进行协调的国际合作。

同往年一样，安理会的报告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提交安理会的各种广泛问题。为了更好地安排我们的资源，我们建议安理会重新考虑它有关报告格式的决定，设法尽量减少报告中不必重复的以前已经印发过的文件数目。可以使我们的这份报告方便用户使用。

这次辩论要求会员国讨论安理会的工作，评估安理会可改进其效率的办法。因此，报告的设计应该提供比较资料，用来分析安理会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工作。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安理会不愿对自己进行主观评价，但报告的格式应该有助于会员国更加方便地了解 and 审查安理会的行动和行动结果。这样，会员国就能通过分析报告所提供的经消化后的资料，更好地协助安理会。

过去一个月所发生的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更加密切的协作。如果我们要击退恐怖主义的进攻，联合国必须统一目标，统一目的。我国代表团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联合国最适合应付这种最新的挑战。

过去两年，我们已看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了新的定义，它已超出传统的军事概念。事实上，有些安全

理事会成员国已提出，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缺水现象，不仅威胁个人或人身安全，而且还可能触发今后的国际冲突。这再次说明需要联合国各机关协作努力。为此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还没有一起开过会。这两个机关早就应该会晤了。因此我们相信，安理会必须应付的一项重要挑战是根据全球秩序的演变，重新界定安理会的作用，同时确认它所肩负的不同于联合国其他有关机关和机构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清楚地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去年又用相当时间解决非洲的冲突。虽然我们热烈欢迎安理会重视我们大陆的局势，但我们也希望对用资源解决非洲冲突有同样的承诺。安理会制止对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境内叛乱集团提供资助与武器的努力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布隆迪局势仍然是对联合国的严重挑战。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此案，并考虑及时参与支持和平进程。

关于另一事项，即作为大会决心促成遵守有关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产物的金伯利进程，在制止冲突筹资钻石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各制裁委员会和小组所作出的努力，欢迎向我们提供的持续支持和开展的合作。我们愿呼吁各制裁委员会将其受制裁限制的实体清单的格式标准化，并确保网址上所载的信息容易进入和用户友好。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样一项建议，即各制裁委员会应协调其工作，使得投资者不会因逐一接待寻求同样信息询问同样问题的制裁委员会而感到不便。

非洲各国发起了新非洲倡议，该倡议是我们大陆解决冲突和促进全球稳定与安全的支柱。我们认为，通过发展和建立实施善政和人权的机构，我们将建立导致各会员国之间以及会员国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和平与合作的基础。我们的经验是，各种冲突的核心是不发达和贫穷问题。换言之，在解决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也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中世界许多人民被迫忍受的生活条件方面。

中东问题仍然是安全理事会面对的重要问题，该地区目前的冲突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对解决这些冲突的必要性迅速作出反应。必须说服安理会重新考虑由当选理事国和某些常任理事国为批准部署可靠的国际观察员机制作出的努力，以监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行政当局编写的米切尔报告的执行情况。

我国代表团积极地密切关注安全理事会为改进其工作和决策方法，特别是改进与部队派遣国合作有关的方法所作出的努力。如去年的塞拉利昂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安理会、秘书处和部队派遣国之间的牢固关系，对于有效管理和实施维和行动并取得其最终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欢迎通过第 1353 (2001) 号决议，将其作为向着改进它们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不过，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就此为止。我们认为，安理会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演变的进程，应该成为不断审议和改进的事项。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不断试图改进安理会与有关利益攸关者之间关系的透明度和相互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安理会努力通过向有关地区派出代表团来获取有关实地的第一手经验。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安理会继续进行公开辩论，一些安理会理事国力求通过更具有相互作用的届会来改进安理会与其他理事国之间相互作用的质量。通过更具有相互作用的对话，安理会将能从理事国有关其活动的看法中获得更大收益。

安理会能够从其辩论中取得更大收益的一个途径是，让秘书处在会议之前散发情况介绍文件。安理会一个理事国今年 4 月提出的另一项有益建议是，只要有可能，秘书处和秘书长代表所作的简报均应该在公开会议上进行，而不是在非公开会议上进行。此外，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可以对特邀演讲人——诸如代表非安理会成员国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提问。

安理会应该认真审议其在解决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平方面所采取行动的有效性。我们认为，仅解决大

量不安全问题中的少数几个问题是不可能实现安全的。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必须要通过解决冲突和不安全的根本原因来解决安全问题。我们已经讲过许多全球化的潜在积极影响，但我们尚未从事减少其潜在负面作用的重要任务。

安理会需要就其制裁——诸如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的效力进行审慎的评估，对伊拉克的制裁给无辜平民造成了巨大苦难。像安理会掌握的其他手段一样，制裁如果得不到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如果得不到区域和其他有影响的行动者的充分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集体行动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进行，应该得到安全理事会和（或）大会的合法授权，以便确保普遍执行。

包括安全理事会当选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必须要维护安全理事会在确定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实威胁方面的主要职责。安理会应根据《宪章》第 41 条和第 42 条决定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措施。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行动绝不能单方面或以区域合伙的方式进行，除非这种行动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并且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实施。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的决定应得到充分审议和广泛协商，因为它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广泛，特别是在援引《宪章》第七章的时候。毕竟理事国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必须要与其共事的伙伴；事实上，安理会是代表理事国并以它们的名义行事。

总之，显而易见，安全理事会以及实际上任何联合国其他机构都必须加入共同努力，以应对新前年的挑战。在这一方面，就改革安理会和扩大其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以实现更大的区域代表权问题进行高级别审议，现在同以往一样重要。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安理会，将能更好地反映当前的国际关系状况。安理会将能以更具有可信性和负责性的方式行事。

我们对新当选的五个理事国表示欢迎，我们也要对在过去两年内非常出色地代表我们的那些当选理事国说一声再见。鉴于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新同事准备应对成为安理会一员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再次提醒

大家，成为安理会一员的特殊荣幸也对安理会每个成员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在安全理事会努力改进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全球需求所作出的反应之际，我们期待着与安理会密切合作。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爱尔兰瑞安大使介绍了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A/56/2）。我们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也感谢安理会秘书处在编写报告方面作出的努力。

尽管每年都受到许多批评，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从基本上与往年报告的特点相同。我们重申，这样的一份报告尽管篇幅很长而且耗费很大，但却远远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和需要。我们期望的不仅仅是文件的汇编，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份实质性和分析性的报告。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不仅应反映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而且还应反映哪些工作未能开展以及其中的原因。报告应阐述安理会成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提交安全理事会年度报告并不是赐给大会成员的一项特权。相反，这是《宪章》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四条中明确规定的一项义务。各会员国不仅有合法的权利，而且有义务细致地评价安理会的工作，确定安理会是否真正代表所有国家行事，是否在履行《宪章》交付给它的重大职责。

1996 年，大会在不结盟运动的倡议下，通过了第 51/193 号决议，它在决议中鼓励安理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供关于其工作的实质性和分析性说明。令人遗憾的是，这项决议虽已通过五年多，但它仍未得到适当考虑，而且大会也未获知其中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大会为何仍未收到安理会应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提交的特别报告。

实行透明的工作方法以及建立与大会之间真正的相互联系不会削弱安理会，而只会加强安理会。在《千年宣言》中，我们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强调必须加强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联系。



目前迫切需提高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安理会所做的决定对所有会员国有着越来越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此外，安理会的决定是靠我们所有会员国，而不仅仅是安理会成员提供资金来执行的。

非公开的非正式磋商即使在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内也未规定，但它依然是惯例，而不是例外——尽管根据安理会的暂行议事规则，如未另作具体的决定，安理会应举行公开会议。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当选成员为促进提高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而作的真诚努力。我们尤其要赞扬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哥伦比亚和牙买加作出了努力，力求使我们区域能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安理会的工作。但光靠这些努力是不够的。

如果安理会继续无视会员国的意见，甚至继续常常不听取那些与所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的会员国的意见，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安理会的工作会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除非特殊情况不允许，秘书处成员或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情况介绍应该在公开会议上举行，而不是闭门举行。

为安理会非成员举行的每日情况介绍会的质量随着担任主席的国家不同而有很大区别。一些此类介绍会至少使我们能够对闭门讨论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坦率地说，其他情况介绍会并无多大助益，这也许是由于一些主席担心其他安理会成员可能会认为它们“过于透明”。

必须使每个月的安理会总结会议成为一种惯例。我们尤其赞扬哥伦比亚采取主动，在今年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总结会议，这是第一次此类总结会议。不仅应该让安理会非成员出席此类会议，而且还应使它们能够通过提出问题和意见来积极参与会议。这将鼓励进行真正的相互交流，从而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帮助。

我们对安理会讨论超出其规定权限的项目并通过有关此类问题的案文这一日益增强的趋势感到关

切。安理会不应行使本属于大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职能。相反，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和其他机构之间建立更好的协调。在4月份，安全理事会曾采取步骤，意图举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安全理事会的联席会议。不幸的是，这一会议未能举行。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安全理事会在推行这一想法的时候过于仓促，此外也由于有人企图规定一些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显然不利的参与方式。在今后，安全理事会与其他机构之间可能的联席会议应在平衡和彼此能接受的参与方式和程序基础上举行。令人惊讶的是，困难是固然存在的，但安理会的文件编制和其他程序问题非正式工作在报告所述期间几乎没有举行什么会议。事实上，它在今年6月举行的会议是一年来的第一次会议。

此外，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除了提到军事参谋团在报告所述期间举行了26次会议外，丝毫没有谈到军事参谋团的工作。因此，我们不可能哪怕只是对参谋团履行或未履行《宪章》所赋重要职责的情况作最一般性的评论，或者对是否能利用它来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能力表达任何意见。

我们深信，只有彻底改革这个机构，目前影响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之所以必须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是因为以其目前的形式，安理会没有而且无法代表联合国会员国的利益和愿望。

否决权这一与时代不符而且违背民主原则的特权必须废除。在否决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只有在维护常任理事国利益的时候才能具有效力。

安理会的改革无疑是整个联合国改革中最敏感和最迫切的内容。在大会就项目49进行辩论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并不是说，不进行这一改革就不能取得任何进展；经验说明，即使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能够而且应该开展努力。

尽管举行公开会议对安理会的决定仍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尽管它们依然是例外做法而不是惯例，但公开会议的数目已有所增多。我们还注意到最

近在安全理事会与部队派遣国之间的相互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与这些国家举行了非公开会议。

历任主席设网址介绍当月安理会工作的做法已变得更加普遍。其中有些网址设置得特别好。

尽管安理会各位前主席可选择编制的每月评价在质量与详细程度上各有不同，但它们是很有帮助的。

今年，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构架内曾经举行了一次有一些安理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今后非常有必要再举行此类意见交流，因为它能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两个机构目前的普遍立场。

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实际步骤是，安理会深入审议在这次辩论中提出的各种看法和建议，并在安排其今后工作时充分地加以考虑。

最后，我谨祝贺保加利亚、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叙利亚代表团最近当选为安理会成员。我祝愿它们在任期中一切顺利。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我谨借这次机会感谢会员国选举保加利亚担任 2002 年和 2003 年期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而对保加利亚所表示的信任。保加利亚将本着责任感和《联合国宪章》及其根本原则的精神履行其任务。

首先，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我的朋友、爱尔兰大使理查德·瑞安作为 10 月份安理会主席非常清楚和精确地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保加利亚密切注视着安理会的工作，并极为重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四条举行的这次辩论，这些条款规定，安理会必须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

我们审议本报告是一次机会来彻底评估安理会在 2000 年 6 月 16 日至 2001 年 6 月 15 日这一时期的

活动。我国深信，这次辩论是一个理想的机会，不仅可以审查安理会的活动，而且也可以审议维持和加强本组织一个主要机构的信誉和效力的方式和方法。

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载有非常全面和详细的情况。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数字。该报告令人信服地表明安理会所完成的大量工作，并充分地表明安理会在处理若干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该报告体现出安理会作出大量努力，以便预防武装冲突，并且作为其主要职责，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部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我国代表团谨强调指出，在审议中的这一时期，安理会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报告提供了许多例子，表明它所做工作的成效。如同往年一样，今年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把在非洲造成破坏的危机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我们看到，非洲的大多数冲突列在安理会的议程上。鉴于巨大的利害关系以及该大陆经常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这是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原因——安理会已经为制止这些冲突作出了可嘉的努力。在包括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若干国家实现和平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因此，安全理事会正在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这是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我们希望，和平与稳定将在西巴尔干这个与保加利亚接壤的地区扎根。尽管该地区最近有某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安全理事会所给予的注意现在与以往一样至关重要。保加利亚重申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并愿再次指出，我们重视所有选民积极参加即将于今年 11 月举行的选举。在科索沃发展一种容忍的文化和多文化是确保各族社区福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然而，我们注意到，对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执行表明在安理会内做法上的某些不同。很明显，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以及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对领土进行国际管理的一种形式。这些特派团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一些国家的文职管

理人员、地方行政官、监狱看守、以及边界守卫人员的参与。

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向冲突地区派出特派团，例如向大湖区和科索沃派遣的特派团。尽管这些特派团并非总是在解决冲突方面促成重大的突破，但是，它们使安理会成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实地的局势，并更好地评估冲突的性质、复杂性和动态。这些特派团使人们了解安理会涉及具体冲突的讨论，这只会促进其决策进程。我们认为，安理会特派团已经成为有效履行其职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应当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其关于制裁的政策，以便提高其效力，同时避免消极的副作用。我国代表团正准备审议 2000 年 4 月设立的制裁问题工作组的工作，以便就这些事项提出有关的建议。

保加利亚认为，必须确保我们重新确定制裁方面的目标，并确保这将导致在实行和解除制裁方面采用一种明确和连贯的方法。这样一种方法应当考虑到平民人口的关切以及第三国的利益，同时提高制裁的效力。

维持和平行动正在变得日益复杂，而且越来越多。财政资源、任务、以及政治意愿都应当结合在一起，使每一项维持和平主动行动行之有效。保加利亚欢迎在联合国秘书处、安理会、以及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派遣国之间加强合作与协调。

最后，我谨赞扬在本次辩论中坦率表明真实的想法，甚至挫折感，而不拐弯抹角的所有那些人。这种做法只会丰富我们的讨论。

作为最近当选的一个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保加利亚共和国准备与其它代表团一道坚定和建设性地进行工作，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在涉及透明度及其效力方面，以便它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最后我要表示热烈祝贺喀麦隆、几内亚、墨西哥和叙利亚代表团最近当选为安理会成员。

**佐藤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衷心地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以及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其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这一及时和理所应当的承认使我们大家感到振奋，确实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然而，当联合国及其受人敬重的、精干的秘书长现在和将来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任务和挑战的时候，他们需要国际社会更大的支持。因此，我要重申日本致力于继续向联合国和秘书长科菲·安南提供尽可能最大的支持与合作。

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爱尔兰大使理查德·瑞安介绍 2000 年 6 月至 2001 年 6 月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然而，我要提请大会注意我的同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以便改进安理会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由于我认为其中许多建议是相关的，因此我要求安理会认真对待这些建议，以便使明年的报告有重大的改进。

近几年来，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活动和决定包括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例如，安全理事会决议所建立的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包括与民政管理、发展以及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等相关的活动。

安全理事会还在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领域作出决定。最近，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规定会员国政府有义务采取全面的反恐怖主义措施，包括在财政领域。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安理会不能单独地应付它所面临的挑战。安理会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充分合作，以执行其各项决定。

因此，我欢迎安理会近几年来愿意频繁地举行公开的和非公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非理事国能够阐述其观点。然而，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加强安理会与非理事国之间的工作关系。这一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涉及非理事国参加安理会讨论的标准。鉴于举行此

类会议的标准仍然不明确，我们要求根据《宪章》第 31 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确定这一标准。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其利益受到安理会决定特别影响的国家应有机会在决定作出之前参加讨论。

另一个方面是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行动中与非理事国的关系问题。

在 6 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1353(2001) 号决议，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它全面地规定了安理会与部队派遣国的关系。尽管我们充分支持加强安理会与部队派遣国的伙伴关系这一主张，但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其观点，即在执行第 1353(2001) 号决议时，至关重要的是，不仅那些提供军事和民警人员的国家、而且那些提供文职人员或者是提供重大财政捐助的国家

应参与进来，以确保维持和平行动有效运作。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扩大和费用增加的前景突出了这种国家参与的重要性。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谈谈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重要性，尽管我打算在另一个场合更加详细地谈论这一问题。

我们都知道，光是安理会工作方法的改进将不足以加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和效力。这将要求对安理会进行改革，以使安理会的组成反映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

我早些时候谈到安全理事会的职责日益增加，这使我们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

下午 1 时散会。